

郭沫若《十批判书》的同时代反响*

李孝迁

【提要】 郭沫若《十批判书》曾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郭氏对该书的自我期许甚高,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也积极宣传郭著,扩大影响。但阵营内外的读者却多持批评、质疑的态度,主要与他们郭氏“褒孔贬墨”观点作泛政治化的解读有关。郭氏与同道的学术纷争聚焦于西周社会性质和孔墨思想的阶级属性,他的学说在同道中属于少数派,几乎受到普遍非难;阵营外的读者或误解郭著的写作意图,或批评他出奇制胜,实证不足,亦多不接受郭的观点。长期以来学界对《十批判书》的评论存在分歧,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存在若干认识偏差,不利于推进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展开。

【关键词】 郭沫若 《十批判书》 吕振羽 泛政治化

郭沫若《十批判书》(1945年)是抗战时期史学界的一部名著,是他继《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以后有关先秦社会史、思想史最系统的论述,也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作之一,曾引起中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该书是1943年至1945年间郭氏发表的十篇论文的结集,^①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以下简称《自我批判》)和《孔墨的批判》二文反响为巨。时人评论郭沫若《先秦学说述林》(1945年)提出殷周奴隶说是具有“天才灼见的结论”,对于中国史学界来说是一个“巨大之‘地震’”。^②《十批判书》与《先秦学说述林》一脉相承,两者所论多有重叠,^③如果后者影响被喻为“地震”,那么前者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国史学界引起持久的争议。不同时代不同人对《十批判书》的认识和评价存在分歧,原本是正常现象,但阵营内外的读者不明郭著的写作语境与真实意图,^④肆意曲解、误读作品的本意,却是该书出版后长期相伴的“非常”现象。本文无意评判《十批判书》学术观点的正误,仅取1950年前后相关论述作为分析对象,揭示《十批判书》被“受”与“拒”的具体情形,藉此检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时易陷入的若干认识偏差。^⑤

* 本文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行动的指针’:中共史家的国史书写(1941—1979)”(项目编号:2023SKZD06)的阶段性成果。

① 各篇完成时间如下:《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1944年7月18日)、《孔墨的批判》(1944年8月1日)、《儒家八派的批判》(1944年9月11日)、《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1944年9月19日)、《庄子的批判》(1944年9月26日)、《荀子的批判》(1944年10月31日)、《名辩思潮的批判》(1945年1月中旬)、《前期法家的批判》(1945年2月18日)、《韩非子的批判》(1944年1月20日)、《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1943年10月3日)。

② 周光岐《郭沫若的〈先秦学说述林〉》,《福建日报》1947年6月2日。

③ 《十批判书》中《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两文,1944年2月最早收录在郭沫若论文集《先秦学说述林》,原题为《韩非子的思想》《吕氏春秋与秦代政治》。

④ 关于《十批判书》成书背景与论学意图,参见李孝迁《〈十批判书〉的写作语境与意图》,《历史研究》2021年第4期。

⑤ 研究《十批判书》的先行论著颇多,但从接受史角度探讨此书者甚少,属于学术性质的专文仅见张越《对〈十批判书〉的评论与争议之回顾与认识——一个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的个案研究》(《学术研究》2010年第2期)。该文第一节“20世纪40年代对《十批判书》的评论”与本文所论有交集,均引征齐思和、朱自清、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和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增订版对郭著的评论。对于前三处史料,本文仅“略人所详”,而关于吕氏对郭著的评论,张越认为这是吕氏对郭著的“赞赏与重视程度”,但笔者的认识与之不同,具体论证见正文。

一、阵营内的不同声音

郭沫若对《十批判书》自我期许甚高,在材料上,“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在方法上,“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定他们的评价”。^①因此,“我对于本书的内容,整个地说来,依然感觉着是正确的”。^②职是之故,郭氏主编的《中原》刊登《十批判书》广告谓“郭沫若先生以其正确深辟之史观,渊博广大之素养,积二十余年治学所得而著本书。其立论之谨严,考据之详尽确实,实敢誉为前所未有之巨著。”^③广告词未必出自郭氏手笔,但他作为该刊主编,坦然接受如此赞誉,多少反映了他的自负心理。

《十批判书》主张西周奴隶说、褒孔贬墨、批判法家等观点,与中国共产党主流观点并不合拍,但郭氏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着力塑造的革命文化界的领袖,他的学术观点得到充分尊重。《自我批判》和《孔墨的批判》不仅发表在重庆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群众》,也转载于延安的《解放日报》。^④重庆《新华日报》专门推介《自我批判》:“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历史学的一件大事,会引起普遍和久远的反响,那是一定的。表现在这篇文章中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很能令人感动的。”^⑤该报还在醒目位置刊登《十批判书》新书预告“这是郭沫若先生最近的一部学术研究的杰作,中国古代社会的意识型态在这儿得到了彻底的清算,考证既极精密,批判尤至严正,发前人之所未发,言并世之所不能言,左右逢源,入深出浅,真善且美,独往独来,凡爱好郭先生之著作者,凡对古代研究有兴趣者,凡欲受新思想之洗礼者,均不可不备此一书,以为终身之伴侣。”^⑥中国共产党似有意凸显郭氏的学术成就,令国民党体制内的学者颇感压力,以致国统区的学人感慨“凡是读到郭先生各种著作的人,都会发生领导学术前进者有在野不在朝之感吧!”^⑦

与中国共产党积极把郭沫若推向学界中心不同,作为个体的左翼学人,对郭氏学术持批评或质疑者不少。《十批判书》完成不久,郭氏乐观地以为《自我批判》提出的殷周奴隶说,“由各方面来判断,中国其余的历史学家这一次是同意我的结论的”。^⑧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郭氏学说向来在同道中属于少数派,诚如他自己承认的,“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多数朋友们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⑨“去友朋间之见解,相迥太甚”。^⑩《十批判书》虽出版于1945年,但其观点此前在不少场合讲过。1941年10月,郭氏在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举办文化讲座,总题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共三次:7日讲“中国古

① 郭沫若《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1945年版,“后记”第410、412页。按:张越《对〈十批判书〉的评论与争议之回顾与认识——一个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的个案研究》一文已指出“最先对《十批判书》作出评价的,却是郭沫若本人。”

② 郭沫若《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光明日报》1950年4月26日。

③ 《中原》第2卷第2期(1945年10月)版权页《十批判书》广告。

④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群众》第9卷第20期(1944年10月31日)、《解放日报》(1945年1月23—28日);郭沫若:《孔墨的批判》,《群众》第10卷第3、4期合刊(1945年3月8日)、《解放日报》(1945年5月7、8、10、11日)。

⑤ 桑《郭沫若的自我批评》,《新华日报》1944年11月20日。

⑥ 《郭沫若先生巨制〈十批判书〉》,《新华日报》1945年6月30日。

⑦ 丁山《〈十批判书〉之批判(下)》,《东南日报》1947年4月16日。

⑧ 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1945年8月3日),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33页。

⑨ 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第410页。

⑩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4页。按:此信应写于1944年8月16日,而不是1942年。

代经济”8日讲“中国古代学术思想”9日讲“古代文学”集中发表了对先秦社会和思想的新见^①后来多写进《十批判书》。据说郭氏讲座听者百余人，“发生很大的争论”，“很多人反对郭先生的主张”。^②

《十批判书》出版后，同道多不接受郭沫若的学术观点，尤其关于西周奴隶说、褒孔贬墨。以吕振羽为例，他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曾猛烈批判郭氏，郭氏也予以有力反击，彼此心照不宣。1946年6月2日，吕振羽在《中国社会史纲》第二卷的“增订版序”中写道：

中国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史家间，看法也很不一致……我曾经有一个打算，想把自己过去对中国史的系统见解，重新检讨一遍。特别在郭沫若先生的大著《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出版后，其中并不少牵涉到拙著《中国原始社会史》和本书的许多主要论点。我一面衷心钦佩郭先生的自我批判精神，一面感谢他给了我不少启发。我把郭先生这部大著细读了三遍，细心考虑了郭先生的高见后，便更决心要把自己过去的全部见解，深入的去检讨一遍。^③

但吕著增订版的“全部见解”几乎没变，仍沿用郭氏指出的错误，尤其随意解释卜辞之处，如“斃奴”“归矛”“鬲侄”“臣在斗”“寇周”等，皆原封不改。1962年重印《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增订版时，吕氏对著作有所修订，但对上述卜辞误读依然保留，不见他有“深入的去检讨”的意向。吕氏还说明改动之处：“仅对一些自己已觉出的错误之点，如对夙允族与周族关系一类的错误看法加以改正。”他强调错误是自己“觉出”，不是别人，这点与郭氏如出一辙。而对郭氏批评的那些错误，吕氏既然不改，表明他不以为误；不仅如此，他还特意声明“在我还没有得出自我检讨的结论以前，对自己原来的见解，没有在文字上提出过改正的见解现在还是坚持的。”^④

吕振羽对郭沫若《自我批判》的微妙态度，从吕著《简明中国通史》的几次修订中也可窥见一二。1949年版和1955年版仍坚持《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的观点，如“取厉取段”“斃奴”“寇周”沿用旧解。^⑤到了1959年修订版，终于有一处改动，不再举证“取厉取段”以说明周初已知铁器。《简明中国通史》1941年初版谓：

周人自古公时南迁至当地后，以其较进步的生产技术和自然富源相结合，农业便得到急速的发展，所谓《公刘》“取厉取段”的冶铁术的发明，也应在这个时期。^⑥

该著1949年版保留上引文字。^⑦1955年版仍坚持，仅在“也应在这个时期”后加了“前后”两字，并添

①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昨在文化工作委员会讲演》，《新蜀报》1941年10月8、9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学术思想之部——郭沫若在文化讲座上讲词》，《新蜀报》1941年10月13日。

② 李初梨《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认识》，《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8日。

③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第2卷，上海耕耘出版社1947年版，“增订版序”第1页。该书第2卷即增订过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

④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第2卷，“增订版序”第2页。

⑤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上册，东北书店1949年版，第58、77、78页；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4、70、71页。

⑥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生活书店1945年版，第84页。该书初版未见，1945年版是初版的再版，两者内容一致。

⑦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上册，东北书店1949年版，第77页。

按语“《考工记》段工不属于冶铜,以及到春秋时便已发明冶铁风箱的情况看,段工应系冶铁工。”^①1959年修订时,吕氏对周初生产工具是否有铁器,不再像以前那样坚定,改称“虽有着发明制铁的迹象,但尚无足够的实物发现”。“取厉取段”从正文移到注释,表明有“发明制铁的迹象”,删去“以及到春秋时便已发明冶铁风箱的情况看”,“段工应系冶铁工”替换成“可能属段铁”。^②1962年重印《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增订版,吕振羽对“取厉取段”作了新解“可能是关于周之先世发明冶金术的传说记述,证之地下遗存是可信的。”他不再坚持公刘时生产力的进步是因为出现铁器,而泛说“金属工具之发明”。^③上述细节的历次修改,呈现了吕氏关于周初铁器论述的节节退守的情形。

将“取厉取段”解释为周初已发现铁,始作俑者是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④吕振羽取之说明殷周之间存在社会大变革。郭氏《自我批判》放弃旧解“这所犯的 error 相当严重。《公刘》篇绝不是周初的诗,锻字的初文即是段字,有矿石、石灰石以及椎冶的含义,并没有铁矿的意思。我以前根据郑玄‘石所以为锻质’的解释认为铁矿,那完全出于牵强附会。”^⑤他改称铁器出现于春秋战国时代,配合其提出殷周相沿都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开始于春秋战国的新观点。然而,吕振羽为了给西周封建论留存一条有力证据,精心守护着郭氏旧说,一厢情愿地认为郭的解释“相当正确”,^⑥直到1962年才放弃此说。关于“衞奴”“寇周”旧解,即使郭氏自己承认误读了,吕氏依然袭用不弃。由此来看,吕氏虽多次讲到要对自己的学说作“自我批判”,^⑦但真正落实有限。

郭沫若《自我批判》虽没有引发吕振羽的“自我批判”,但不表示前者对后者没有震慑作用,因为《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增订版删改了初版中嘲讽、挖苦郭氏的文字,减弱了批评力度。初版谓“我们的‘历史家’,更从而可以作出以残余作为主要,以局部概括全部的结论来。这在郭沫若也同样犯了这一实验主义的错误……这已完全在追随着实验主义者,郭先生自己或者还不知道哩!”^⑧增订版删除了这些文字,改成语气和缓的表述“我们著名的史家郭沫若先生,对殷代以至中国古代社会的看法,也有些意见是值得商讨的。”^⑨初版严厉批判郭氏后来已放弃的殷代婚姻制度“多父多母”:

我们的“历史家”,却以其“盲天过海”的手段,把历史的记载——实际,这些记载也是很明白的——有意无意的故意混淆,将殷代的历史挪回到多少万年以前去。^⑩

吕氏最初批评的“历史家”,其实特指郭沫若。有趣的是,1962年重印增订版将上引文字修改如下:

我们的有些历史家,却以其“瞒天过海”的手段,窃取郭沫若先生以往的说法,把历史的记载——实际,这些记载也是很明白的——有意无意的加以颠倒、混淆,将殷代的历史挪回

①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0页。

②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1—112页。

③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28页。

④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15页。

⑤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沫若《十批判书》,第51—52页。

⑥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不二书店1936年版,第18页。后文未注明版本时均指此版,特此说明。

⑦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完稿序”,第2页。

⑧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第7—8页;吕振羽《殷代奴隶制度研究》,《劳动季报》第2期,1934年7月。

⑨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第2卷,第8页。

⑩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第128页。

到多少千万年以前去。^①

经吕氏的修改,从原本单数特指,改成“有些”复数泛指,成功地将郭氏从他所批判的对象中解救出来。诸如此类的细微改动还有不少。20世纪50年代以后,吕氏公开表态自己及其他追随郭氏研究殷周社会的人“或者还可以说是他的私淑弟子”。^②

《自我批判》很多地方也指向翦伯赞,后者虽没有作出正面回应,但从后续发表的论著来看,翦氏大体仍坚持旧著《中国史纲》(1944年)的观点。以1956年翦伯赞、邵循正、胡华编著的《中国历史概要》为例,此书第一部分“古代的中国”出自翦氏的手笔。关于西周是什么社会,翦氏说“现在中国的历史家正展开辩论,有的认为是初期封建社会的开始,有的认为仍是奴隶社会。”主张“初期封建社会的开始”是范文澜,坚持奴隶社会的是郭沫若。翦氏在此书虽没有明确提出西周是封建社会,但他“根据现有的考古学和文献上的资料,关于西周社会的主要状况”指出四个特征:其一,西周的社会生产力,比之商朝更高;其二,西周的社会生产关系,比之商朝确实有些改变;其三,西周的等级制度与宗法制度是分不开的;其四,西周的文化,是在商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③翦氏的倾向性非常明显,不同意郭氏的西周奴隶说。关于铁器出现的时间,翦氏不再坚持《中国史纲》观点——至迟在殷末,^④提出中国已有铸铁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⑤接受了郭氏的判断——春秋战国时代。^⑥《中国历史概要》是应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需要而写,1953年完成初稿未被苏方采用。^⑦翦氏之所以不明确提出西周封建论,或有两方面的顾虑:其一,彼时中国史学界正为此争论不休,尚未形成共识,《中国历史概要》最初署名“中国史学会编”,代表中国史学界的观点,故不作定论;其二,苏联史学界多主张西周是奴隶社会,与中国史学界主流观点不合,此举可避免与苏方针锋相对。需要说明的是,翦伯赞是坚定的西周封建论者,1961年他主编《中国史纲要》先秦部分最初由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吴荣曾执笔,在古代史分期问题上,采用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后来为了更有利于百家争鸣,翦氏亲自执笔西周至战国部分,改用自己素所主张的西周封建论。^⑧可见,翦伯赞虽不曾公开批评过《十批判书》,但他与之观点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十批判书》除了首篇《自我批判》,其余诸文讨论先秦诸子思想,其中郭沫若的“非墨”观点,几乎“犯了众怒”。^⑨1946年杨荣国出版《孔墨的思想》一书,所论与郭氏完全对立,认为孔子是维护旧社会的,墨子反而“甘和下层社会为伍,来反对贵族”。^⑩郭氏谓墨子思想“不民主”,杨氏则强调“墨子的思想并非不民主,并且还相当民主呢!”^⑪彼此针锋相对隐约可见。1947年侯外庐、杜守素(杜国庠)、纪玄冰(赵纪彬)合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吸收了《十批判书》的一些观点,但对郭氏“非

①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04页。

② 吕振羽《关于“怎样学习中国历史”等问题的解答》(1950年11月),吕振羽《史学研究论文集》,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6页。吕振羽致郭沫若信谓“大革命时期我是你的部下,在学习历史科学方面,我等于你的私淑弟子。”《吕振羽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5页。

③ 翦伯赞、邵循正、胡华编著《中国历史概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页。

④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版,第188页。

⑤ 翦伯赞、邵循正、胡华编著《中国历史概要》,第6页。

⑥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沫若《十批判书》,第52页。

⑦ 张传玺《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277页。

⑧ 邓广铭《关于本书的几点说明》(1978年3月3日),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⑨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沫若《十批判书》,第418页。

⑩ 杨荣国《孔墨的思想》,生活书店1946年版,第61页。

⑪ 杨荣国《孔墨的思想》,第120页。

墨”他们仍持批判态度。《中国思想通史》保留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意见“我们研究思想史,毫不把古人的优良传统抹杀,而画一个脸谱。”^①侯氏批评指向其实是郭沫若。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论及墨子,不点名批评了郭氏“我们读墨子的书,就须联系着他的社会背景来研究,凌空地下批评,未有不犯错误的”,^②“墨子明白地主张尊天事鬼,富于宗教的色彩,好像有点开倒车”。^③杜氏正是回应郭氏批判墨子说“事实上他是在开倒车,因而我说他‘反动’,倒并不限于他迷信鬼神的那一点。”^④1949年,赵纪彬发表有关墨子的文章也隔空回应郭氏,他说“近人对于墨子‘非乐’思想最有力的一种误解,就是从字面着眼,将‘非乐’二字直译为‘反对艺术’而加以批判。”^⑤因为郭氏《孔墨的批判》谓“‘非乐’不仅在反对音乐,完全在反对艺术,反对文化。”^⑥

作为《十批判书》学术论辩的局外人,华岗对郭沫若之好翻案很不以为然,他公开批评“郭沫若先生最近在《十批判书》中,又大做翻案文章,特别攻击墨家,而赞扬儒家,因此有人说郭沫若成了抑墨扬儒论者。其论据既甚牵强,而历史意义也多被颠倒。郭先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历史家,又是我所敬仰的革命战士,但是他在历史翻案工作中,常常以出奇制胜,而不以正确制胜,我却期期以为不可。”^⑦1948年,华岗在香港发表《谈谈历史方法》,仍处处针对郭氏,谓“有人完全不顾历史条件,硬说孔子是‘革命家和科学家’,并且攻击墨子,说他反革命和反科学”,这是“根本不合历史方法”的荒谬现象。华岗批驳“无论如何,墨子比之儒家,总起了进步的作用。可是,竟有被称为现代科学史家的人,大唱其抑墨扬儒之说,硬说墨子思想有‘反科学反民主’的因素,这显然是以今天的眼光和标准,去要求数千年前的墨子,而且所说墨子思想中有‘反科学反民主’的因素,也只是一主观的推断。因为在墨子所处的时代,根本没有产生现代意义的科学和民主,如何能够拿不可能的事情,去苛责墨子?所以这种扬儒抑墨的论断和估价,根本不合历史方法与历史精神。”他口中“现代科学史家”实指郭沫若。此外,华岗在结束该文之时仍不忘再次暗讽郭氏创作于1942年的历史剧《孔雀胆》:“历史既然是科学,我们就必须以科学的历史方法去处理,不能自以为是,不能从‘想当然’出发,不能掺杂主观的好恶和成见,去修改历史事实,不能因为‘我热爱阿盖公主’,就连带把她的丈夫段功——一个投降敌人反对农民革命的民族败类,也硬要写成好人,把一个应该否定的历史人物,写成肯定的历史人物,以骗取观众的同情眼泪。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浪漫主义作风,而不是对人民负责的科学态度。而医治这种浪漫主义毛病的对症药方,最好还是科学的历史方法。”^⑧

二、阵营外的不同评论

如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曾引起中国学界的普遍争议,《十批判书》亦复如此。首先,因立场不

① 侯外庐、杜守素、纪玄冰《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新知书店1947年版,第192页;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文风书局1944年版,第151页。

② 杜守素《先秦诸子思想》,生活书店1946年版,第16页。

③ 杜守素《先秦诸子思想》,第23页。

④ 郭沫若《孔墨的批判》,郭沫若《十批判书》,第103页。

⑤ 纪玄冰《论墨子“非乐”的经济思想》,《新中华》第12卷第8期,1949年4月。

⑥ 郭沫若《孔墨的批判》,郭沫若《十批判书》,第103页。

⑦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作家书屋1946年版,第37—38页。

⑧ 少峰(华岗):《谈谈历史方法》,香港《文汇报》1948年10月29日。

同而抨击《十批判书》者。诚如郭氏所言“假如是不同道的人,要受他的攻击,那是很平常的事。”^①时人不明《十批判书》的写作语境与意图,常用泛政治化的眼光解读郭著,以为处处别有用意。《孔墨的批判》一篇指出孔墨的基本立场不同,孔子顺乎时代潮流,帮助乱党,同情人民解放,而墨子则相反。在当时国共两党矛盾不断激化,乃至最后兵戎相见的情境之下,他们对郭氏论孔的意图作了不着边际的想象:

郭沫若先生是一位热中政治的学者,他的私人生活与基本思想是浪漫与动摇的,他很乖巧,经常在利用历史、歪曲历史,给反国家民族利益的人找哲学上或理论上的根据……孔子在中国人心中所占的地位极重,任何中国人多少都受有他的影响,郭先生体会到这一点,便搜集了许多材料,说明孔子是前进的,是反抗环境的,是时代的反叛者,郭先生的兴趣并不在学术上,而是在这样一证明、这样一论断,会给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如下影响,即孔子是同情反政府的,因而信仰孔子的人不该来拥护政府,应该占在反政府的这一方面。郭先生为了这个目的用了很大的工夫,在故纸堆里发掘,来寻找其论断的根据。^②

这种极富“创造性”的解读,根本不合郭氏撰写《孔墨的批判》一文前后的语境。无独有偶,岑仲勉也误读了郭氏论墨的用意:

现在某强国日日主攻,一面又要到在所欲攻之国,来“反非攻”以涣散其心力,于是不能不说“非攻”仍是奴隶人民,把墨子涂成了曹操的脸谱(效郭语),但须知“反非攻”的说越能推行及远,主攻者越不见有利,人人皆攻,斯已成独夫矣……顾处于被人攻之时期,则奉墨子为“古代的鲍尔塞维克”,处于可攻人之时期,则目墨子为“开倒车”及“反动”,其实同一鼻孔出气,举“随时的改涂脸谱”及“有意的错涂脸谱”之两事,兼而有之而已。夫政治家须用权术,自周至今莫能变……然施之于学术研究则不可;吾人所需要,是坦白的、真纯的学术研究,绝不需要“曲说的”及“利用的”学术研究。^③

作者有意,读者有心,文本一旦完成,进入阅读界,读者之心未必能领会作者之意,其所会之意,往往与作者本意有别,甚至走向反面。上述两位读者的“别解”,恰如郭氏坦承“那可不是我的本意。”^④

其次,从学术角度评郭著,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意见。否定者多从治学方法立论,以为郭氏所论偏宕。作为“甲骨四堂”之一,郭沫若在《自我批判》中每每利用卜辞、金文的释读达到“反批判”的目的,他所批评的同道如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都没有能力与之论辩,但古文字学同行并不完全接受郭氏的释读。譬如“寇”字,《十批判书》一改旧说,承认自己认错了,卜辞中并没有该字,应是“聘”

① 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第418页。

② 涑之《读〈十批判书〉》,《甘肃民国日报》1947年9月13日。

③ 岑仲勉《墨学解》(1948年3月27日),《学原》第2卷第8期,1948年12月。岑仲勉《对于孔学的我见》(《东方杂志》第43卷第6号,1947年3月)一文认为郭沫若《孔墨的批判》“和近年多数学者的见解,几于对立,但‘意简言赅’,确是值得称赞的一篇批评孔学的文章”。他同时指出,郭氏根据《墨子·非儒》篇中关于孔子的七件故事而谓孔子袒护“乱党”,那是不可信的。

④ 郭沫若《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光明日报》1950年4月26日。

字,其义正相反,殷周为同盟友好关系,不是殷征讨周人。^①容庚对郭氏此举颇有微词,“寇固非是,聘亦何尝必然。郭氏于字,必求其解,故难免武断。”^②

董作宾看过《十批判书》,1947年12月他在美国写《殷虚文字甲篇自序》,征引《自我批判》,一面赞扬郭沫若“勇于认错,是很可佩的”,一面不点名批评郭氏“我们不能据字形说‘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听命,民与臣是奴隶,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隶,因而断定殷代是奴隶社会。这是很有问题的。”^③郭氏不久即见到董文,非常不满,他说:

最近读了参加殷墟发掘的另一人董作宾的《殷墟文字甲篇自序》,其中有些地方在斥责我,而且在反对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虽然承蒙董先生没有直接指出我的名姓,但这指责的是我,那倒毫无问题。^④

1949年之前郭董关系原本颇佳,彼此推重,郭氏《自我批判》称道董氏甲骨学的成就,“在这一方面贡献最多的要算是董作宾。他同李济博士从事殷虚的科学发掘固然是永不磨灭的功绩,而董氏在卜辞研究上进到断代研究的一步,在作为他个人的功绩上是尤其辉煌的。”^⑤但1950年郭氏态度剧变,他藉《十批判书》改版之际,一面删除初版赞誉董氏的文字,一面猛烈反击董氏的批评,且火力超出学术之范围,谓“就是这种非学者的态度,逼得董先生在今天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不懂就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⑥

不少学者指出《十批判书》新奇有余,实证不足。陆复初《批判〈孔墨的批判〉》一文不同意郭氏的孔墨论述,批评他牵强附会。^⑦齐思和最初认为郭著论考证不如钱穆之精,论思想又不如冯友兰之细,“颇难得新见”,并且“以自我批判起,以自我介绍终,无不表现文人自夸心理”。^⑧到1949年,他却认为郭著“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有许多重要的贡献”。^⑨署名“匏公”的人认为《青铜时代》《十批判书》:

虽然充满了新奇的说法,或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我觉得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似乎远不如在金石甲骨方面的贡献。例如他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的第一章)虽然“清算”了他过去的不少错误,却又造下不少新的错误。原因是金石甲骨之学是以实在的材料为根据的,这里很难逞玄想;而在学术思想上的研究,郭君有意无意的要推陈出新,出奇制胜,而纸上材料只有这些,不用奇想,不能胜人,于是乎不知不觉的陷于方法上与态度

①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沫若《十批判书》,第9页。

② 容庚《甲骨学概况》,《岭南学报》第7卷第2期,1947年6月。

③ 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篇自序》,《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95、699页。

④ 郭沫若《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光明日报》1950年4月26日。

⑤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沫若《十批判书》,第4页。

⑥ 郭沫若《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光明日报》1950年4月26日。

⑦ 陆复初《批判〈孔墨的批判〉》(上、下),《中央周刊》第7卷第23—25期,1945年6月。

⑧ 齐思和《十批判书》,《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

⑨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发展》,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174页。

上的错误。^①

作者选《孔墨的批判》一文加以批评,指出郭氏有客观态度,但方法成问题。《墨子·非儒》篇中的故事,与孔子思想比较,无一不相凿枘。假使如郭氏所谓《非儒》篇的故事能代表孔子的基本立场,那么《论语》以及一切儒家著作都得完全推翻,只好当它们是孔门后学的伪作了。因此,“希望郭君还是多研究史实,不要把历史考证的方法根本抛掉,而将学说建筑在沙滩上,否则学说无论如何新奇,终久是站立不住的”。^②

肯定者强调《十批判书》创见尤多,文字可读。朱自清推崇郭著“差不多都是对于古代文化的新解释和新评价,差不多都是郭先生的独见。”^③张岱年一方面承认郭著“创辟的见解甚多,虽也不少证据不足、近于武断之处,然而证据凿确、精审不移之见解更多”,另一方面指出“著者本是文学家,所以文笔极其流畅,虽是考据文字,而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尤属不可多得”。^④丁山为《十批判书》撰写书评,高度评价郭氏的学术成就:

五四以来,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著作,多半蒙受胡适之先生的影响,断自孔子,春秋以前,大抵有搢绅先生难言之隐之感。惟有郭先生熟读《诗》《书》《易》《春秋》,而又有卜辞金文学的湛深的修养,才敢由殷商的天道观念直讲到孔子伦理思想的构成,与夫老庄、墨翟、申韩、名辩诸派的相互影响,将古代思想的因缘,上溯一千年;将儒道以后的思想,清理出新体系来。拿我外行眼光看,这才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第一部成熟著作呵……古代文化,因为卜辞金文大量的发现,多数学者的研究,逐渐的袒裨裸裎于我们的眼前,这种飞跃的进步,就从民国二十年以后郭先生一部一部的著作像剥蕉样子追踪出来,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他才是真正领导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前进者。《十批判书》正是研究先秦思想史的前进站。^⑤

丁山与郭氏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有所交往,此篇书评虽“从友人之请”而写,^⑥但不能说是吹捧之文,因为他给朱家骅一封策划与左翼文化抗衡的私人信函中也承认郭著“实已超越左翼思想之宣传,而踏入纯学术境地”。^⑦此外,徐芸书亦赞誉《青铜时代》《十批判书》构成了“一部卓异的先秦思想史”。^⑧

余 论

阵营内外的不同读者,对郭氏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千差万别,不仅涉及学术争鸣,也存在立场、意气、争胜等非学术成分。总体来说,《十批判书》反响虽巨,然批评、质疑的声音远多于肯定,多半与对郭氏“褒孔贬墨”作泛政治化解读有关。对同道而言,“褒孔”意味着替旧势力张目,客观上助长了敌

① 鲍公《读郭沫若作〈孔墨的批判〉》,《经世日报》1947年4月2日。

② 鲍公《读郭沫若作〈孔墨的批判〉》,《经世日报》1947年4月2日。

③ 佩弦(朱自清):《十批判书》,《大公报》1947年1月7日。

④ 张季同(岱年):《十批判书》,《大公报》1947年4月6日。

⑤ 丁山《〈十批判书〉之批判》(上、下),《东南日报》1947年4月9日、16日。

⑥ 《丁山日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第611页。

⑦ 转引自桑兵《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2页。

⑧ 徐芸书《读郭沫若氏〈白果树下书〉》,《新江苏报》1948年2月19日。

方气势,“贬墨”则削弱了中共利用历史资源的正面意义,与中共主流基调相悖;对于国民党一方来说,郭氏将孔子塑造成袒护乱党的革命者形象,有被视为引导知识分子同情、倾向中共的嫌疑,同样不受欢迎。《十批判书》的主要观点与国共两党的政治文化均不甚契合,陷入普遍的孤立,反倒说明此书论学并非为政治所左右,其实反映的是左翼史家内部不同观点的对话。

今人也常从政治角度说明《十批判书》在当时的现实意义或局限所在^①,但这些解读与郭著的本意颇有距离。郭氏“褒孔贬墨”正是反对当时社会弥漫着“古为今用”的“反历史主义”做法。^②从《十批判书》撰写前后语境来分析,郭氏至少在主观上一再强调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过于轻率地诬枉古人”,^③“我们要还他个本来面目,一切凸面镜凹面镜乱反射镜的投影都是歪曲。我们并不要因为有一种歪曲流行,而要以另一种歪曲还它。如矫枉而过正,依然还是歪曲。答复歪曲的反映,只有平正一途。”但他客观上能做到几分那是另一个问题,“我自己也不敢夸说,我已经是走上了这一步,但我是努力向着这个目标走的”。^④

《十批判书》行文带有时代的痕迹,采用政治色彩浓厚的词汇,如“人民”“民主”“专制”“反动派”“独裁”“侵略”“法西斯”等,彼时社会现实确实影响了郭氏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观感,产生偏颇之论。例如,他将秦始皇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相提并论,视《韩非子》为一种“法西斯式的理论”,^⑤但他似无心歪曲历史,翻云覆雨,以学论政,迎合某种政见。^⑥当然,这并不等于说郭氏所论就实事求是,完全没有主观偏见。

以《十批判书》接受史为例,笔者以为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警惕若干认识偏差。

其一,文本与语境相脱离。前人与今人往往不顾文本产生的具体语境,对《十批判书》作泛政治化的解读,不论肯定它的正面意义还是作负面的批评,多为过度诠释,不合郭氏写作的真正意图。尤其《自我批判》一文,不同时代的读者都以为郭氏意在自我检讨,殊不知他是以退为进的论述策略,达成反批判之目的。当然,语境不是现成的,需要研究者全面发掘史实细节加以建构。不同研究者都宣称从语境出发,但所得的结论可能大相径庭。

其二,文本本意与读者会意相混淆。《十批判书》问世以来,读者对它的理解和评价分歧很大,模

① 康绳法《郭沫若墨子研究管窥》,《郭沫若学刊》1988年第4期;杨胜宽《郭沫若眼中的“宗教家”墨子》,《郭沫若学刊》2014年第1期;解启扬《郭沫若的墨学研究》,《中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② “在社会变革的时期,价值倒逆的现象要发生是必然的趋势。前人之所贵者贱之,之所贱者贵之,也每每是合乎正鹄的。但感情容易跑到理智的前头,不经过严密的批判而轻易倒逆,便会陷入于公式主义的窠臼。在前是抑墨而扬儒,而今是抑儒而扬墨,而实则儒宜分别言之,墨则无可扬之理。在前是抑荀而扬孟,而今抑孟而扬荀,而实则孟并未可厚非,荀亦不必尽是。”郭沫若《先秦学说述林》,东南出版社1945年版,“后叙”,第369页。

③ 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第420、423页。

④ 郭沫若《先秦学说述林》,“后叙”,第371页。

⑤ 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第415页。

⑥ 郭沫若自述立场“我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立场来阐明各家学说的真相。我并不是以一个宣教师的态度企图传播任何教条……是什么还他个什么,这是史学家的态度,也是科学家的态度。”(郭沫若《先秦学说述林》,“后叙”,第367、368页)外人也有承认郭氏治学的严肃性,如李长之评《青铜时代》说“我们虽不敢确说百分之几的郭沫若先生是科学家,然而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郭先生之为科学家,是较之他为诗人更有资格些的。他有科学家之寻找问题的先见,他有科学家之证实自己的假定的方法,他有科学家之决断地自信,却也有科学家之一旦发现了错误时而放弃旧说的勇敢。细密,切实,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这是我们读了这部书时所重新感到的。”当然,郭氏的方法也有缺点,常因爱求统一之故,而把矛盾的事实予以想象的解释,“然而无论如何,郭先生的论点,都是偏于建设性的,他的疑古也不是五四时代之素朴地疑古了。从这里,看出中国学术进步的一面,看出时代精神的变换,更看出中国的确在走向‘文艺复兴’的大道。说到这里,便真是太令人兴奋鼓舞了!”(李长之《青铜时代》,《时与潮文艺》第5卷第4期,1946年1月)

糊了文本的本意。郭氏扬孔之举,被视为助力反对政府,同道则谓之“袒护儒家”,^①各式各样的尊孔之徒因郭氏对孔子翻案而得意,^②但这些认识都偏离了郭氏论学旨趣,一如他自己所说“有人读了我的书而大为儒家扶轮的,那可不是我的本意。”^③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不仅读者对文本的感知有别,甚至包括作者本人对作品初衷的定位也发生微妙变化。^④只有厘清两者的异同,才能准确认识作品的本意及其接受状况。

其三,回避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内部的论争。吕振羽承认“不同学派、不同意见的存在,是合乎客观规律的,因而其相互间的争论不只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不只是在和敌对流派的斗争中,而且是在自己阵营内的不同学派、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成长、壮大、发展起来的。‘百家争鸣’就是人民内部不同学派、不同意见的争论,马克思列宁主义阵营内部不同学派、不同意见的争论。真理愈辩愈明,问题愈辩愈深透。”^⑤揭示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原本潜在的各种论辩,一方面这是重建史实的工作之一,是后续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可更深入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它不仅在与敌对势力论战中成长,也是在阵营内部的各种观点交锋中走向成熟。

其四,放大以学论政的面相,忽视以学论学的追求。在革命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家固然大多“怀着革命的激情来研究历史的……历史成了鼓动现实斗争的手段,科学性就被摒在更次要的地位了。有时出于对反动统治的厌恶和愤慨,借古讽今,虽与事实不尽相符,也自觉理直气壮,无可非议”,^⑥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所有作品都是基于现实政治考量,像时人曹聚仁无差别地指责唯物史观著作包括《自我批判》,“为了宣传,乱用史料,不择手段”。^⑦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完全可能达成求善(政治)与求真(史学)两者间的平衡,《十批判书》是一个有力的尝试。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虽有共性,然每位史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品,处理学术和政治的方式各异,不能一概而论。研究者应该努力克服泛政治化思维,面对具体个案(甚至同一史家的不同时期、同一作品的不同篇章)具体分析,不作脸谱化论述。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固然需要重视政治面,但也不能忽视学术面,以及社会、人事等其他各种复杂因素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作者李孝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研究人员;邮编:200241)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敖凯)

① 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第420页。

② 史说《孔子的翻案》,《大公晚报》1945年8月27日。

③ 郭沫若《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光明日报》1950年4月26日。

④ 以评论秦始皇为例,《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篇,郭沫若完成于1943年10月3日,此前1942年6月他写过历史剧《筑——高渐离》。1956年,郭氏说“我写这剧本时是有暗射的用意的,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因而对于秦始皇的处理很不公正。秦始皇是一位对民族发展有贡献的历史人物,蒋介石哪能和他相比。”(郭沫若《高渐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作为严肃的历史作品,《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否也“存心”影射蒋介石?1950年改版《十批判书》,郭氏没明示修改《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但事实上这篇删改之处不少,主要是些偏颇之论,如删去“近时学者对于秦时代的南征北伐颇致赞美,但过细推论起来实在是功不掩过。主要的还是侵略性的战争坏了事,这是无可讳言”等。

⑤ 吕振羽《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大力开展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光明日报》1960年12月24日。

⑥ 黎澍《革命、批判和科学性——耿云志著〈胡适研究论稿〉序言》,《人民日报》1985年5月3日。

⑦ 曹聚仁《中国通史批判》,《前线日报》1948年4月4日。

SUMMARY OF ARTICLES

Marching on the Road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 Interview with Dai Yi on His Study of Qing History // Zhang Jianbi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xist historiography has occupied the mainstream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a number of well-known Marxist historians have emerged, who have made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have a far-reaching social impact. In the field of Qing history, Prof. Dai Yi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Marxist historians. In the form of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e document his intellectual journey of studying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of conducting research in Qing history. Besides, he has also talked about his views on major theoretical issue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explained his innovative practice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Qing history project. This interview includes precious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Learning from these materials, we can rethink their valuable experience in the study of Marxist history.

The Contemporaneous Reverberations of Guo Moruo's *Shi Pipan Shu* // Li Xiaoqian

Since its publication, Guo Moruo's *Shi Pipan Shu* (*Ten Critiques*) had attracted so much attention among scholars that the author himself had high expectations for it. The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of CPC also actively promoted this work to expand its influence. However, readers were often more critical and questioning of this book, mainly because of their pan-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Guo's views of "praising Confucianism and derogating Mohism". The academic disputes between Guo and his colleagues were focused on the social nature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on the class standing of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Guo was a minority among his peers who almost universally questioned his views. Readers outside the camp either failed to understand his writing intentions or criticized him for making assertions yet without sufficient evidence to back up. Most of them often disagreed with his views. The long-existing differences in commenting of *Shi Pipan Shu* in scholarly communities are derived from some cognitive biases in the stud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in-depth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he Dual Identity of Late-Qing History Textbooks // Li Fan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history textbook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writing dynastic histor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nation-state,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narr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late-Qing history textbooks not only emphas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ynasty, but also had a favor of nation-state, and strived to achieve the dual identity goals of the dynastic-state and the nation-state. These two aspects also led to some inconsistencies in the compilation of textbooks. Textbook editors tried their best to cancel the internal tension of identities as the dynastic-state and the nation-state by balancing the two in the text, highlighting the shared idea of "great unification" in both. They adopted